



CISS 海外信息专报

(2026年4月23-24日)

1、美国兰德公司：人工智能正重塑化生放核领域安全格局

4月16日，美国兰德公司发表研究员丽贝卡·K.C.赫斯曼（Rebecca K.C. Hersman）、劳伦·布莱克韦尔德（Lauren Blackwelder）、约翰·V.帕拉基尼（John V. Parachini）撰写报告《人工智能对化生放核防御政策与项目的影​​响：战略分析研究议程》。报告认为，美国国防部全场景推进人工智能应用，正深刻改变化学、生物、放射性、核（CBRN）领域的攻防平衡、军备竞赛与战略稳定。人工智能技术具有双重属性：一方面为 CBRN 防御、威慑与危机响应提供技术赋能，另一方面也大幅降低了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研发、获取、使用 CBRN 武器的门槛，加剧武器扩散、滥用与战略失稳风险。报告强调，当前人工智能安全与传统 CBRN 防御两大领域存在严重的部门壁垒、认知分歧与协作障碍，风险评估、安全基准与危机响应体系碎片化，难以适配人工智能技术高速迭代的发展节奏。为此，报告呼吁美国构建跨领域共享研究议程，建立动态风险体系、公私协同的安全基础设施与国家级评估生态，充分挖掘人工智能防御端潜力，同时推动该议题纳入全球安全合作框架，建立国际协同的风险管控机制。

<https://www.rand.org/pubs/perspectives/PEA4611-1.html>

编译：钟珺雯

2、美国“科技政策网”：制定合成数据标准刻不容缓

4月15日，美国“科技政策网”发表世界银行人工智能顾问马塞尔·莫姆哈（Marcelle Momha）的文章《在智能体人工智能时代制定合成数据标准的紧迫性》。文章认为，当前亟需修订现有人工智能与数据保护框架，制定相关标准以评估合成数据的准确性与实用性。随着大型语言模型（LLMs）的训练逼近互联网可用人类数据的上限，合成数据正逐渐成为替代性核心材料。合成数据在保护隐私、扩充稀缺数据集、减少偏见等方面具有重要价值，但也易形成与现实存在偏差的“合成镜像”。在当前缺乏统一标准与专项监管的情况下，其风险将被显著放大。在具备自主决策能力的智能体人工智能（Agentic AI）系统中，不准确的合成数据可能导致错误沿推理链条扩散，不仅会影响决策结果，还会加剧责任认定的困难。文章认为，当前最切实可行的方法是修订现有人工智能与数据保护框架，建立明确评估标准，并规范隐私保护指标。这些标准应要求记录合成数据集的生成、训练和部署方式等信息，并从伦理和社会影响等多维度对其进行评估，从而提升治理有效性，增强公众信任。

<https://www.techpolicy.press/the-urgency-of-standards-for-synthetic-data-in-the-era-of-agentic-ai/>

编译：程果

3、美国《外交事务》：在对华竞争中中美需确立四大科技制高点

4月16日，美国《外交事务》杂志发表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的文章《科技制高点：如何在与中国的竞争中占据优势》。文章认为，科技已成为中美竞争及塑造世界秩序的核心前沿，美国长期视中国为技术追赶者的假设已不再成立。中国已围绕生产规模、关键投入品控制及基础层主导权构建另一套权力理论，并在稀土加工、医药前体、动力电池等“杠杆节点”领域逐步建立支配地位。文章强调，中美科技竞争并非短期冲刺，而是多赛道、跨世代的长期较量。美应同步确立四大“制高点”：一是通过研发投入、移民改革、“曲速行动”式产业动员与盟友产能协同（allied scale），重振技术—工业基础，并聚焦计算、生物技术与生物制造、清洁能源三大技术族群。二是依托低成本无人机、无人水面艇、分布式传感器及人工智能赋能的联合作战体系推动军事创新，将威慑台海冲突作为首要任务。三是以嵌入民主价值、透明融资与高安全标准的美国数字基础设施，对冲中国技术栈出口，从而主导人工智能安全评估、合成生物学红线等国际标准制定。四是与中国维持稳定底线，延续2024年核武器人类控制共识及美中科技合作协定续签等务实安排。文章重申“小院高墙”式精准出口管制的合理

性，主张对先进半导体、量子计算与生物技术装备维持严格限制，而非与中国全面脱钩；同时批评现政府破坏盟友协调、忽视风险与安全治理的做法，呼吁形成跨党派的长期对华战略共识。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united-states/tech-high-ground-jake-sullivan>

编译：张朔宁

4、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中美人工智能竞争关键在于技术转化实效

4月16日，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网站发表其研究员凯尔·陈（Kyle Chan）的文章《中美两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竞争策略》。文章认为，美人工智能战略核心聚焦于算力规模扩张与通用人工智能（AGI）研发，以算力驱动前沿模型迭代。美国科技巨头正投入约6500亿美元建设吉瓦级数据中心，推进AGI研发。美人工智能前沿模型的整体性保持明显领先，并主要通过闭源商业模式确立全球盈利优势。此外，美国在自动驾驶和顶尖机器人基础模型领域仍是行业标杆。中国人工智能战略重心则在于模型效率提升、人工智能普及应用以及与物理世界的深度融合。中国将人工智能视为赋能制造业、医疗和科研的通用技术，中国厂商则专注于通过算法创新在有限算力下挖掘更高性能，推行开源策略以迅速占领新兴市场。此外，中国正全力推进具身智能发展，力图在人形机器人

产和物理应用集成领域实现突破，并推进半导体全产业链国产化以应对外部制裁。文章认为，美在算力规模与顶尖模型算法上拥有决定性优势，而中国则在模型效率、普及率及制造业的融合上展现出极强的韧性，竞争的胜负取决于谁能更有效地将人工智能转化为广泛的经济和社会收益。

<https://www.brookings.edu/articles/competing-ai-strategies-for-the-us-and-china/>

编译：张方琼宇

5、美国《外交事务》：人工智能智能体引发新型网络战风险

4月16日，美国《外交事务》杂志发表人工智能政策与战略研究所前沿安全研究主任布里安娜·罗森(Brianna Rosen)与该所高级研究员詹·克拉普拉永(Jam Krprayoon)合著文章《网络战的新前沿：人工智能智能体将如何威胁全球安全》。文章认为，人工智能智能体逐渐从辅助工具演变为自主行动者，当前技术防御和法律框架尚未做好应对准备。相较于过往网络攻击受限于攻击者的能力边界，人工智能智能体凭借自动化、高效率的特性打破了这一约束。同时，其自主性可能使智能体执行未经操控者授权的行动，甚至演变为难以关闭的失控智能体，将网络攻击从可控攻击升级为不可预测的安全威胁。对此，文章提出三方面建议：一是将自主网络智能体列为情报收集优先事项，建立人工智能安全事件强制披露机制；二是加强关键基础设施网络安全防御，强化

相关机构的人员配置与技术研发能力；三是建立跨部门协调机构，推动政府与产业界共享威胁情报，合作研发人工智能防御工具。最后，文章认为，现有国际法和网络治理规则主要适用于以人为主导的攻击，无法解决人工智能智能体高度自主性与攻击难以归因的问题。中美等大国应推动双边及多边协议，将治理重点从问责转向共同投资检测能力、共享情报与建立协调应对机制，以降低人工智能失控带来的全球安全风险。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united-states/cyberwars-new-frontier>

编译：杜宛鸿

6、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人工智能军事应用削弱决策与问责机制，引发监管危机

4月16日，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发表研究员拉鲁卡·切尔纳托尼(Raluca Csernatonu)的文章《人工智能战争的迷雾》。文章认为，人工智能虽显著提升战场效率与打击精度，但决策制定周期压缩与信息过载加剧新型“战争迷雾”并引发监管危机，欧洲应在负责任的军事技术治理中发挥引领作用。加沙与伊朗的战场实践表明，算法评分及概率目标生成速度远超人类评估极限。人类虽在决策链中，但缺乏足够时间进行有效审查与干预，形成“有监督无判断”的局面。同时，决策权限拆解至开发者、数据工程师及操作人员等多方主体，

导致责任分散与问责机制弱化，引发有别于传统战争的不确定性风险。文章认为，当前国际治理滞后且缺乏约束力，而美国在军事人工智能规范方面的立场不仅弱化，甚至将规范视为创新障碍，这为欧洲提供了制度塑造空间。欧洲应将人类进行审慎评估、行使干预所需的时间视为战略资产而非作战负担，并在人工智能全生命周期中制定可执行红线，确保人类判断具有实质性约束力，避免算法化打击成为战争常态。
<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europe/strategic-europe/2026/04/the-fog-of-ai-war>

编译：高美琳

7、美国西点军校现代战争研究所：高风险军事决策不应保留人类最后否决权

4月16日，美国西点军校现代战争研究所发表圣克拉拉大学管理与创业学教授迈克尔·A.桑托罗（Michael A. Santoro）的文章《致命决策的设计：人工智能、问责制与军事判断的未来》。文章批判了“高风险军事决策必须保留人类最后否决权”这一传统，认为在时间高度压缩、信息严重缺失的危机环境下，人类监督往往最不可靠。在微弱信号下人类能做出的情境判断，理论上均可被纳入算法模型；反之，若战争态势突发多变以致算法失效，那么承受巨大认知负荷与心理压力的单兵做出的判断同样难以令人信任。遗漏威胁与误伤平民的权衡判断无法由个体在瞬时完成，需要事前通过军事

条令、交战规则与伦理约束进行系统性校准。基于此，文章重构人类介入的架构层级。在上游设计阶段，由人类设定系统参数、校准风险平衡、划定操作边界，构成最具决定性的决策控制节点。在战术执行阶段，操作员的角色应从单次目标决策的否决者转变为全局系统的监控者，其核心工作在于监测系统性失效。两种监督方式将互为补充，但若将人类最终否决权视为主要的纠错机制，那么这种安排在结构层面本质上是脆弱。这一框架也重塑了军事人工智能系统的问责逻辑——责任将沿指挥链分级分配至设计、采购、部署等前置环节，并借助军事司法体系中已有的“错误、过失、蓄意不当行为”的区分标准并加以延伸。高风险环境中的信任无法通过最后一刻的人类干预完成，需要基于系统设计过程中已内置的合理的风险权衡与清晰的问责机制。

<https://mwi.westpoint.edu/designing-lethal-decisions-ai-accountability-and-the-future-of-military-judgment/>

编译：张佳延

8、国际计算机协会：需警惕人工智能治理问责陷阱

4月20日，2026年国际计算机协会公平、问责与透明度大会（FAccT）发表普林斯顿大学副教授珍妮特·维尔特西（Janet Vertesi）等学者的文章《审视人工智能的政治经济学：在追求问责中避免“诱饵”》。文章认为，人工智能并非单纯技术项目，而是由出资方、科技企业与精英主导的世界构建

和权力扩张工程。其核心是掌握网络构建权力，依托实体基础设施，形成排他性权力网络，实现资源、资本与财富的集中垄断。当前围绕人工智能公平性、责任追究与治理的讨论普遍陷入五种诱饵陷阱：“本体论诱饵”用定义之争回避权力网络建构；“必然性诱饵”用人工智能发展的不可避免性为资本投入与风险承担提供合理性；“颠覆性诱饵”以劳动力替代等表层议题掩盖权力与资本的结构重组；“安全诱饵”夸大通用人工智能风险以回避现实不平等与环境损害；“监管诱饵”表现为企业主导规制以巩固自身地位。这不仅转移了公众注意力，更让批判者在无形中共同建构并巩固了其权力体系，制造出问责与治理的假象，让监督停留在表面，无法触及物质政治经济结构与核心权力格局。要实现真正的公平、责任与透明，必须识别“诱饵”何时、以何种方式起到干扰作用，摒弃单一技术或法律解决方案，直面人工智能工程的物质政治经济本质。

<https://arxiv.org/abs/2604.16106>

编译：孙韵雯

9、美国《国家利益》：特朗普的经济反噬

4月20日，美国《国家利益》杂志刊发其经济专家德斯蒙德·拉赫曼（Desmond Lachman）的文章《特朗普的经济清算》。特朗普第二任期已满15个月，其承诺的高速增长、低通胀、制造业繁荣和贸易平衡的“黄金经济时代”并未到

来。文章认为，2025年美国经济增长速仅略高于2%，今年预计持平；而年通胀率年底将达4%，高于其上任时的3%。尽管特朗普将进口关税提至百年最高，制造业就业仍持续下滑，贸易赤字居高不下。文章强调，其三大政策失误后果显著：一是混乱推行高关税，对几乎所有贸易伙伴征收15%统一关税，钢铝加征50%，纽约联储研究显示超90%成本由美国企业和家庭承担，耶鲁预算实验室估计这将推高通胀约1个百分点，迫使美联储暂停降息；二是推动《大而美法案》的减税计划，未来十年将增3.4万亿美元赤字，使赤字超2万亿美元（占GDP6%），公共债务占比至2030年将超过二战后水平；三是对伊朗主动开战，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自2月底关闭，全球20%石油天然气和30%海运化肥供应受阻，油价一度突破100美元/桶，化肥价格大涨。文章警告，特朗普一边维持高赤字，一边攻击美联储独立性、试图撤换理事以操控货币政策，可能引发国债和美元市场的“清算日”。这些因素叠加，将使共和党在11月中期选举中难以向选民证明经济好转，特朗普可能如2024年靠通胀议题胜选，2026年反被同一把剑刺穿。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donald-trumps-economic-reckoning>

编译：白一冰

10、美国 PIIE：美亟需重建氦气储备

4月21日，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IIE）发表高级研究员罗伯特·Z·劳伦斯（Robert Z. Lawrence）的文章《在下次冲击来临前重建氦气储备》。文章认为，伊朗战争暴露了全球氦气供应链的极端脆弱性，美国亟需重建现代化的战略氦气储备。文章认为，3月卡塔尔 Ras Laffan 氦气设施因地区冲突被迫停产，该设施占全球约三分之一供应，恢复全面产能需三至五年。氦气作为 MRI 设备、光谱仪、粒子加速器和半导体生产不可替代的冷却剂，其物理特性决定了它无法像普通商品长期仓储存放，必须依赖地质储层和专用管道等基础设施长期保存。然而，美国联邦氦气储备自 1996 年起逐步私有化，2024 年已将剩余储备及基础设施售予私企，且氦气于 2022 年和 2025 年被移出美国地质调查局关键矿产清单，未被纳入 2026 年启动的 Project Vault 战略关键矿产计划。文章强调，氦气不是普通商品：其供应与天然气生产挂钩而对价格不敏感，全球加工设施高度集中且地缘政治风险突出；私人储备决策仅考虑个体成本收益，无法内化供应链中断对整体经济的系统性外部成本。全球半导体生产所用氦气年价值仅约 10 亿美元，建立战略储备成本相对有限。文章建议政府建立特殊氦气储备，与 Project Vault 互补，通过商业用户轮换库存（以粗氦、纯化气态或液态形式），覆盖数月全球半导体需求即可缓冲最严重冲击。文章强调，这一提议虽无法解决当前危机，但可为下一次供应冲击提供战略

保险，避免世界再次为这种“看不见却支撑日常关键技术”的气体而陷入慌乱。

<https://www.piie.com/blogs/realtime-economics/2026/bring-back-helium-reserve-next-shock-hits>

编译：罗方婕

11、美国企业研究所：特朗普对美联储的攻击适得其反

4月21日，美国企业研究所（AEI）发表其高级研究员、经济政策项目主任迈克尔·斯特雷恩（Michael R. Strain）的文章《特朗普对美联储的攻击反而损害自身》。文章认为，特朗普对美联储有三个目标：一是希望任命新主席凯文·沃什（Kevin Warsh）；二是希望现任主席杰罗姆·鲍威尔（Jerome Powell）在任期结束后离开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三是希望更低的长期利率。他制造了针对现任主席鲍威尔的刑事调查，试图以此迫使其降低利率。多名共和党参议员对该调查表示担忧。特朗普在后续采访中为该调查辩护，不顾美联储惯例，称如果刑事调查让鲍威尔留任更久，那自己“必须解雇他”。特朗普此举引发的法律争议一方面将延迟参议院对沃什的确认；另一方面会使投资者预期美联储独立性受到削弱，从而带来更高通胀，并进一步提升长期利率。文章建议共和党参议员若想确保沃什顺利获得确认，应说服特朗普不再为自己设置障碍。

<https://www.aei.org/op-eds/trumps-self-defeating-attacks-on-the>

-fed/

编译：高靓瑜

12、美国 CFR：霍尔木兹海峡对峙考验特朗普的对伊停火协议

4月20日，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CFR）发表作家兼编辑玛丽尔·费拉加莫（Mariel Ferragamo）和拉丁美洲方向资深作家兼编辑戴安娜·罗伊（Diana Roy）的文章《霍尔木兹海峡对峙考验特朗普的对伊停火协议》。文章认为，在美国与伊朗经历近6周冲突并在巴基斯坦斡旋下达成临时停火后，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反复封锁与开放，使这一脆弱的停火协议持续承压。文章认为，停火的核心条件是：美国暂停对伊军事打击，前提是伊朗必须完全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限制铀浓缩活动；而伊朗则表示，只有在美以停止对其及盟友的军事行动后，才会停止“防御性行动”，并在其协调下保障海峡通航。然而，由于以色列在黎巴嫩持续打击真主党目标，伊朗多次重新关闭海峡，使停火协议不断受到冲击。此外，美伊在关键议题上分歧明显，包括海峡控制权、制裁解除以及铀浓缩问题。伊朗提出的“十点和平方案”要求解除制裁、保留核计划并维持对海峡控制，而美国则明确反对伊朗继续进行铀浓缩。尽管特朗普政府声称部分争议已有进展，但双方谈判基础依然薄弱。文章进一步认为，首次在伊斯兰堡举行的面对面谈判未能取得突破，海峡通航与封锁问题反而成

为新的对抗焦点。美国对伊朗港口实施有限封锁，伊朗则以袭击航运作为回应，形成“以封锁对封锁”的对峙局面。专家普遍认为，双方虽均有意避免冲突升级，但对“停火出口”的理解存在根本差异，使协议前景充满不确定性。最后，文章强调，国际社会普遍支持停火并呼吁重启谈判，但由于结构性矛盾未解，加之地区多重冲突交织，这一停火更可能以不稳定、间歇性维持的形式存在，短期内难以转化为持久和平协议。

<https://www.cfr.org/articles/as-a-strait-of-hormuz-standoff-grows-will-trumps-fragile-iran-ceasefire-hold>

编译：王一凡

13、报业辛迪加：国际经济秩序断裂后的全球经济治理

4月21日，报业辛迪加网站发表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IIE）高级研究员让·皮萨尼-费里（Jean Pisani-Ferry）与希腊前财政部长乔治·帕帕康斯坦丁努（George Papaconstantinou）的文章《后特朗普世界》。文章认为，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断裂，全球治理需转向由欧洲与中等强国承担关键责任的“共管”模式。当前新格局已呈现出以下特征，一是布雷顿森林体系作为锚定机制已失效，美国放弃全球角色与多边主义衰落叠加，对其造成不可修复的裂痕。二是全球贸易难以恢复既有开放水平，一方面，中国制造业优势与巨额顺差重塑结构性格局；另一方面，美国将长期延

续其高关税政策。三是全球秩序瓦解产生规范性冲击，美国对既有行为准则的破坏使体系难以修复。文章强调，未来全球治理需转向务实“共管”模式，在容纳多样发展路径的同时，约束损害他国与全球公共资源的政策，但其路径的核心挑战在于，当美国缺席时，规则由谁制定与维护。以国际货币体系为例，美元正受美联储独立性争议、债务扩张与贸易碎片化侵蚀；欧元具备扩展条件但受制于政治意愿，人民币区域作用上升但仍受约束，国际货币体系长期更可能走向多极格局。然而欧盟在贸易协定、WTO 改革与对华战略上行动迟缓，尚未发挥领导作用。文章强调，需要由欧洲与中等强国组成联盟，通过强化国内韧性与规则供给，在碎片化世界中承担稳定器角色。

<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middle-powers-should-establish-credible-alternative-to-decaying-us-led-order-by-george-papaconstantinou-and-jean-pisani-ferry-2026-04>

编译：贺宇希

编译：钟珺雯、程果、张朔宁、张方琼宇、杜宛鸿、高美琳、张佳延、孙韵雯、白一冰、罗方婕、高靓瑜、王一凡、贺宇希

审核：刘源、郑乐锋、周武华、申青青